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主题与意义	— 2
第二节 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 7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全书结构	— 10
第一章	
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14
第一节 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 14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江西的农民流动状况	— 20
第三节 从历史视角来看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	— 26
第四节 结语	— 30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农民流动的兴起、发展与特点	— 32
第一节 农民流动的缘起	— 32
第二节 农民流动的发展与现状	— 35

第三节	农民流动的规模与广度	—	39
第四节	外出务工人员的结构与特点	—	43
第五节	结语	—	47
第三章			
1978 年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状况及			
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		
	生产状况分析	—	49
第二节	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分析		
		—	57
第三节	结语	—	64
第四章			
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分析			
第一节	农民流动状况与农业生产	—	67
第二节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与农民流动		
		—	72
第三节	外出务工收益与农业收益的差异		
		—	75
第四节	农民流动的成因分析	—	78
第五节	结语	—	82
第五章			
农民流动与乡村传统社会意识的变化			
第一节	农民流动与农村文化意识的变化		
		—	86
第二节	农民流动与农村经济意识的变化		
		—	91
第三节	农民流动与农村政治意识的变化		
		—	96
第四节	结语	—	102
第六章			
外来民工对流入地农民非农化转移的			

影响力分析:以上海青浦区为例	— 105
第一节 区情概况	— 106
第二节 青浦区农村劳力非农化转移的历史和现状	— 107
第三节 青浦区外来务工人员的结构和特点	— 110
第四节 影响青浦区农村劳力非农化转移的因素分析	— 113
第五节 结语	— 117
第七章	
回眸与展望:农民流动影响的综合分析	
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前景预测	— 120
第一节 农民流动的影响:利与弊	— 120
第二节 农村社会发展的前景预测	— 128
第三节 结语	— 136
附录	— 140
农民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调查与分析	— 141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	
江西省泉塘村的个案调查	— 189
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喜忧——	
对江西省东洛村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 245
农民流动的现状、成因与影响——	
对江西省杨村的观察与思考	— 283
农民外出务工与就地转移的尝试——	
江西省新基村个案调查与分析	— 313
农民流动与农业、农村的发展——	
江西省沙田村个案调查	— 332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流动与回归——	
江西省坊城村个案调查与研究	— 363
外来民工的甘苦谈	

一个独特群体的生活感受(访谈一)	— 398
年轻农民工的甘苦和希冀——	
外出务工农民的访谈报告(访谈二)	— 408
务农与务工间的趋利性选择——	
外流民工访谈实录(访谈三)	— 420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访谈(访谈四)	— 431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访谈(访谈五)	— 436
<u>主要参考文献</u>	— 440

前 言

20 世纪后 20 年,在经历了大变革大发展后的中国农村,又面临着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新压力。世纪之交,当全体国民刚迈进梦寐以求的小康门槛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因此,积极投身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学术关怀。

出于工作业务需要和个人志趣的双重驱动,我们一直没偏离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和关怀。2001 年,笔者申请到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年度重点课题《江西农民流动问题探析》,为完成这个项目的研究,我们邀请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司法警官学院、宜春学院、上饶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十多位学者,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江西省 14 县市 20

个村的农民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立体式的实证研究。在课题研究正准备结项时,2002年我们又有幸申请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1世纪农民流动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于是,课题组成员又按照新的要求多次回到各样本村进行补充调查和跟踪研究。

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设计的主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农民流动给农村社会和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发展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性?从课题组成员历经近三年时间所完成的研究报告及其综合比较分析看,我们对农民流动的影响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这一主题,有了一个较为客观、清晰的认知,从而对农民流动的影响给予了客观有力的论证。因此可以说,本项调查的初始目的基本达到。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先后自发地出现了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乡镇企业和农民流动三次大的社会变革,它们也先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三个焦点问题。特别是农民流动的“利弊”之争,一直是理论界争辩不休的热点问题。不过,大家的认识比较统一的是,从今天来看,农民流动的兴起引发了两项重要的变化:一是农村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已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这必然促使农民价值理念出现变化。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为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非农偏好”的宏观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全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要求,导致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对政府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

众所周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农村劳动力的富余问题也凸显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限制民众迁徙和流动的政策松动,加之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开发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对劳力需求的急剧增长,农民流动逐步兴起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

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期。农民流动是否是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必然结果?根据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如果说农民流动是因为农业中存在着过剩劳力,它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将有效地抑制工业劳力价格上升,促进工业资本积累;同时,由于农业过剩劳力减少而产量不减少,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与边际生产率就会上升,导致农业劳动效益与报酬提高,这会使城乡劳动比较收益逐渐趋于平衡而使推动劳力转移的心理压力逐渐减轻,农民流动出现相对停滞。可现实并非如此,农民流动一直在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农业生产也并没有因为农村富余劳力的外流和迁移而快速增长,反而处于平缓的发展状态。后者的出现,似乎又如舒尔茨所认为的农业部门中的问题不是劳力过剩,而是其他要素不足。然而,反观 1982—1984 年、1994—1996 年两次粮食政策性大提价的影响,就可发现其后不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而是厌农弃农情绪加重,并两次引发农村社会出现大的变革。从这可以看出,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同步推行的中国农村,农民流动与其他要素再配置过程中的反馈机制必然有自己的特点,而不可能完全套用某种经济理论模型。因此,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意义深远。从农业生产变化状况入手研究农村社会发展,从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解析农村社会的现实处境及未来发展,应能收到“以小见大”的功效。

鉴于目前国内研究较多受理论模型的影响的现状,我们确定本项目的研究重点有三项:一是农民流动本身的分析,即农民流动的历史过程、现状及结构变迁;二是农业生产变化状况研究,全面解读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生产变化状况、影响因素;三是农民流动的影响比较,解析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社会意识的影响、后果及其意义。如何实现对这三个重点的研究,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依据的主要是一个三维分析框架,即行为主体维度、社会结构维度和制度环境维度相结合的框架。当然,这三个维度本身又都是多元视角的组合。

我们的研究报告即融上述多维视角于一体,不仅有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现实描述,更有对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宏观政

策环境及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的全景解读。同时,本着从个案研究走向类型研究之需要,我们还以 20 个样本村的个案研究报告为基础,并参照本课题组成员及国内外学者所完成的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对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这个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形成了本书的 8 章。本项目的调查与研究由曾绍阳、唐晓腾主持和组织,唐晓腾负责了对课题研究要求以及本书各章结构的设计。舒小爱、唐炎华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本书附录还收入了 7 个村的个案研究报告和 5 篇民工访谈报告。各篇个案研究报告的作者依次为:唐晓腾、舒小爱(原分别工作于中共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江西司法警官学院,现都调至上海市青浦区工作),王爱华、刘好萍(江西农业大学在职研究生),胡银根(宜春学院),杨林(宜春学院,南京大学博士生),邓美英(江西师范大学),尹雅伟(宜春学院),熊英(宜春学院)。各篇民工访谈报告的作者依次是:陈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吴晓华(上饶师范学院),刘好萍,王爱华,余清华,张周炆,姚海南(南昌高等专科学校)。

应当说明的是,本着“调查求深、研究求实、问题求真”的原则,本课题组成员尽管多数来自于各自调查的个案村,对其变迁的过程有着切近的观察与体会,但仍按统一的课题设计多次返回样本村作深入调查。各个案研究报告也都是数易其稿,反复锤炼,期望既能达到调查者即时研究的目的,也能为他人以后的研究提供历史资信。不过,尽管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方法来确保本项研究的科学性,但仍有局限性。虽然我们的调查研究人员多是有经验的研究者,但田野调查博大精深,仍然难以确保每位研究人员都能抓住乡村社会中关键性的信息和环节,并能准确解读。因此,各篇研究报告的质量难免是瑕瑜互见,有所参差,而且不可避免会有因信息缺失和误读带来的漏洞;同时,本项研究由于调查面上的局限和个案选择上的非随机性,其结论应是探索性、预测性的,并不具有对中国内地广大农民流动现实状况总体判断的代表性、推论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书中对各篇报告所涉及的地名及人名,部分作了技术处理。全

书最后由曾绍阳、唐晓腾修改定稿。

本项目研究能够在近三年的时间内顺利完成,还因为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应该感谢接受调查的样本村村民们及各级领导热情、友好的接待和帮助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调查给予的理解与宽容;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厚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樊平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女士、美国乔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教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余悦研究员,他们曾对本项目的研究及多篇报告提出过极为宝贵的意见;还要感谢课题结项专家评审组成员:南昌大学黄新建教授、中共江西省委党校肖唐鏢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黄建刚研究员、浙江大学卫龙宝教授,他们为本课题研究的完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和观点,为课题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独到的见解。最后,我们应当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金给予本项研究的立项和资助。

曾有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但只要我们能不拘于经验,用敏锐的目光去观察社会,用科学的思想去解读现实,用发展的理念去思考未来,理论就不再是灰色,而是像生活之树一样万古长青!

作 者

2004年6月12日



前
言

导 摇 论

历史的、现实的词汇,现在正频频集中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提出“民为重,君为轻”,到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从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留下的“农村税赋定律”,再到当代湖北省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太厚重的历史积存,太沉重的社会思索,太殷切的现实期盼。世纪之交,当全体国民刚刚迈进梦寐以求的小康门槛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不仅再次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成了国内许多研究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政策的推行而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民工潮”,近年来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热点。学者们纷纷聚集于农民流动

问题的研究,各种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但是,已有成果主要是从“民工潮”对流入地的影响和作用或者“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这一视角出发的,作为个案的研究也大都选择沿海地区的农村。而作为“民工潮”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其影响和作用又如何?特别是作为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的中西部地区,“民工潮”对农业生产又带来怎样的影响?等等问题,却关注不够、重视不足。本课题正是从这一问题切入,通过对中部地区的一个省份——江西省 20 个村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来对 21 世纪中国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状况作初步的研究和预测。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主题·意义

研究现状。中国农民流动问题,自卢建业在《南洋研究》(上海)1928 年第 5 期发表“国际移民问题与中国”一文后,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兴起了第一次研究热,如谭其骧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相继发表了《湖南人由来考》和《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胡传楷发表了《安徽宣城的广东村和洪杨乱后的宣城人口》,陈清晨于 1940 年发表了《人口西迁与中国前途》等等论文;其后于 1957 年步入“大萧条”时期,到 80 年代末、80 年代初,又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一项研究热点,至 90 年代初,农民流动问题研究达到高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87—2000 年的 13 年间,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农民流动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章达 258 篇。此外还有 10 部研究农民流动的主要专著(作者分别为陈俊生、陈吉元和庾德昌、袁亚愚、韩俊、杜鹰、赵树凯、辜胜阻、黄平、蔡、周沛)以及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多卷本《中国移民史》,石方的《中国人口迁徙史稿》,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史》等等。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

1. 1994 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农业部农经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劳动就业部就业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人口所、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八家组成的课题组,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深入研究取得的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包括杜鹰等著的《走出乡村》、黄平等著的《寻求生存》、赵树凯著的《纵横城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劳动部的《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等。

2. 1995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科院对珠江三角洲外来民工状况和北京大学对东莞民工状况进行的调查研究,以及北京大学、北京零点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强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研究员等组织和个人多年来对北京外来民工的跟踪调查和研究。

3. 1994—1995年袁亚愚、吴鹏森、杨青、张文等人对四川、安徽等农村劳动力剩余大省农民流动状况进行的调查研究。

4. 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以及宋林飞、顾焕章、叶南客、李芸等人对苏南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就地转移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

5. 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对外来(出)务工青年的专题调查研究,及其1999年度依据对全国23省(市)45个县(市)4316名农村青年的抽样调查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6. 近年来陆子修与史贤华、李玉江与程道平、梁世夫与王爱莲、刘宇与周叔莲、郭克莎、唐晓腾等等,分别对安徽、山东、湖南、四川、江西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流动状况的调查研究。此外,翟学伟、宋林娜、杨学成、朱明芬、李南田、田凯等学者则通过解剖一些乡、村或企业个案,来研究农民流动问题。

众多的研究文献,在对农民流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农民流动的作用力、过程、状况、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国内关于当代农民流动的研究还处于启动阶段,研究的时间还不长,对日趋活跃的农民流动问题特别是其成因、动机、影响的全面了解和把握还没达到应有的程度,有深度的成果并不多。而且,在这一研究领域

中,与社会学和人口学界的投入热情相比,应用经济学界的关注则显得明显不足。

对当代农民流动问题的研究尚且如此,那么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更为不足了。由于较多地受某些理论模型的影响,因此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在国内学术界虽有所涉及,但多是静态对其进行“利弊”判断,而对两者之间的系统反馈或循环机制以及政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离散”作用却缺乏全面的特别是微观的考察。在1984年颁发《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国家颁布《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的规定》之初,强调农民流动的“消极面”和“弊端”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曾是一些同志主张对农民流动实行“堵截”和“限制”的一种普遍心态(至今这仍是相当部分同志的担忧所在)。当然,这些年来研究表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全无道理。如据秦晖1995年组织清华大学学生对浙、湘、黔、川、陕、桂6省(区)8县(市)的19个村庄进行的考察结果表明,农民流动后,农业劳动的效益(报酬率)是提高了,但农业生产的产量与效益是趋于下降的。赵树凯1999年根据在北京的火车站对818名外出就业民工开展的问卷调查,从农民流动的动机(谋生还是求富)着眼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当前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间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唐晓腾组织的对江西12县(市)16个村的调查结果反映,农民流动带来了劳力外流地区农村的衰落,农业生产效益与耕地利用率也大大下降。但是,也有一些调查表明,农民流动推动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西玉组织、开展的对9省13县市的调查结果,认为农民流动催化乡村发展。这些争论和事实说明,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究竟如何,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扎实地进行研究才能作出回答的课题。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同样值得研究的还有一系列问题,如:1. 当前农民流动究竟有什么新变化、新特征? 2. 农民流动的规模到底怎样? 其变化趋势如何? 造成这种变化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3. 农民流动对农业生

产究竟有多大影响？4. 如果有影响，那么，在影响农业生产的诸因素中，农民流动因素实际上处什么位置？5. 如果有影响，那农民流动又是如何对其发生影响的呢？6. 如果有影响，又该怎样来评价这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又将怎样？如何看待和怎么对待农民流动问题？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中还少有人对这些基本而又现实的问题进行过客观而又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西方经济学界，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先后取得并发表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的《乡村变迁》，[法]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美]马尔科姆·吉利斯等的《发展经济学》，[美]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经济增长理论》，[美]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的《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对策》，[美]西奥多·W·舒尔茨的《经济增长与农业》《改造传统农业》，[印度]苏·加塔克等的《农业与经济发展》，[美]罗伯特·M·索洛等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美]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英]A. P. 瑟尔瓦尔的《增长与发展》等等，并形成了研究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问题的两大理论模型：刘易斯模型（以及类似的费—拉尼斯模型）与舒尔茨模型，和研究农民流动原因与农民价值理念的两种相互对立和争辩的理论论题：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管是刘易斯，还是舒尔茨，也不管是波普金，还是斯科特，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来自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考察研究，他们的观点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都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都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社会的，这就对解答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还缺乏现实指导意义。

显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不能苛求于国外的学者。国外汉学家虽然一直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但限于种种条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上半叶及其前的农民流动情况，依据的多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南满惯行调查”资料或20世纪

5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教会对华南等地的考察素材,如1919—1920年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D. H. 库尔普指导学生对广东潮汕凤凰村调查而写的《华南乡村生活》,1921—1925年间金陵大学教授J. L. 卜凯对中国7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为期5年调查而作的《中国农家经济》,华洋义赈会总会C. B. Malone和J. B. Taylor两教授于1922年组织的对冀、鲁、苏、皖、浙等省240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调查写出的《中国农村经济》。此外,还有中国学者的成果,如陈翰笙博士于1928—1934年间组织数十位研究者对无锡、保定和广东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调查的有关资料,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等。50年代以后,只有为数极少的国外学者(如黄宗智、David. F. Sly、葛迪斯、塞缪尔·何保山等)曾深入我国农村,对农民流动近况作过贴近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农民流动问题有些独到的研究,如David. F. Sly对农民流动中信息的传递和带动流动扩张的主要桥梁是缘于血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的看法,塞缪尔·何保山对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的研究等等。另外就是美国著名学者何炳棣、日本学者夏井春喜考察和论述了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地区人口的变化和战后移民问题。但是,国外汉学家对中国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却不愿发表多少意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者那里(如马若孟、Claude. Aubert、D. Gale. Johnson、Calin. A. Carter等),他们也无法据实对当前中国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互动关系问题发表看法。

研究主题和学术价值。在中国,经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学,固然离不开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借鉴和运用,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对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及根本性问题进行自己的理论综合和理论创造,建立一套最适合中国实际的学科语言和理论体系。事实上,在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大汇聚、大碰撞、大综合的中国,这样的根本性论题大量涌现,使经济学建设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极好机遇。毫无疑问,我国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道纯经验性研究论题,而正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实证性研究论题。它不只是技术性地讨论和解释性地理解有关规范农民流动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它实质上还是一个农村社会怎样组织、管理和构造的问题,是一个怎么处理国家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分歧及进行制度性整合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调处农村现代化与农村社会传统、政府政策取向与民众行为选择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本课题,实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学。

研究目的和意义。对当前我国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问题,尤其是对农民流动问题,至今人们的争论仍然较大。如对农民流动现象,有人持“乐观”态度,主张“放”、“引导”;有人持“悲观”态度,主张“收”、“堵截”;还有一种持“中间”态度,主张顺其自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农民流动问题虽然一直保持着客观的态度,先后制定、下发了一些加强外出民工管理和规范农民有序流动的有关文件和通知,但并没把农民流动放在公民权益与全要素配置的背景下来考虑,因而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相关改革也是滞后的。与此同时,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没有得到加强。这样,预期利益的驱动与“制度性的厌农、弃农”相交合,形成了现时代背景下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研究本课题有着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 有助于澄清人们在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一些不当认识和观点,为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基础。2. 有助于修正和完善有关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第二节 摇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村落和村委会是中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因此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不仅是人类

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①。

本课题研究的 20 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 20 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分析这 20 个村的基本概况,就可发现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从区域分布看,处于江西东部的有朝阳村、芳山村,居江西西部的有杨村、栗水村、东洛村、高汪村,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有柳田村、泉溪村、新基村,处江西南部的有东林村、马岭村、肖田村,位江西中部的有滁山村、坊城村、旧下村、康山村,还有古竹村、泉塘村、沙田村处于江西的西南部,吴村位于江西的东南部。从行政区划看(见表 0-1),分别隶属于 17 个县 9 个地级市,南昌市(2 个)、九江市(3 个)、赣州市(1 个)、吉安市(6 个)、上饶市(2 个)、宜春市(3 个)、萍乡市(1 个)、新余市(1 个)、抚州市(1 个),占江西省 11 个地市的 82%。从区位看,位于城镇郊区的有杨村、芳山村、康山村,其他村与城镇都有一定的距离,大约在 15—25 公里之间,泉溪村、高汪村、东林村和马岭村还属于偏僻的山区村落。就交通而言,交通方便的村占 45%,交通一般的村占 25%,交通不方便的村占 30%。地处平原的 6 个,丘陵地带的有 8 个,山区的有 5 个,水乡 2 个。从行政村的规模看,人口在 2000 人以上的有 6 个即杨村、滁山村、康山村、吴村、沙田村、东洛村,人口在 1000—2000 人的有芳山、古竹、朝阳、柳田、旧下、栗水、东林、马岭、泉塘等 9 村,人口在 1000 人以下有坊城村、泉溪村、高汪村、肖田村、新基村等 5 个。

^① 关于以村落为中国农村研究单位的方法论讨论,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曾作了详细的评论,可参见该著的第一章。李国庆(2000)和唐鏢(2001)对此也有相关介绍。